



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

三晋石刻大全



●晋城市陵川县卷

主编 王立新



总主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晋城市图书馆



0510100331756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陵川县卷 / 王立新主编. —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457-0741-0

I. 三… II. ①王… III. ①石刻—陵川县—图录
IV. ①K877.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7642 号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陵川县卷

总 主 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本卷主编: 王立新

责任编辑: 张仲伟

助理编辑: 周 雨

审 订: 陈霞村 张玉玲 马剑东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晋城市景潮办公用品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8

印 张: 89

字 数: 6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741-0

定 价: 48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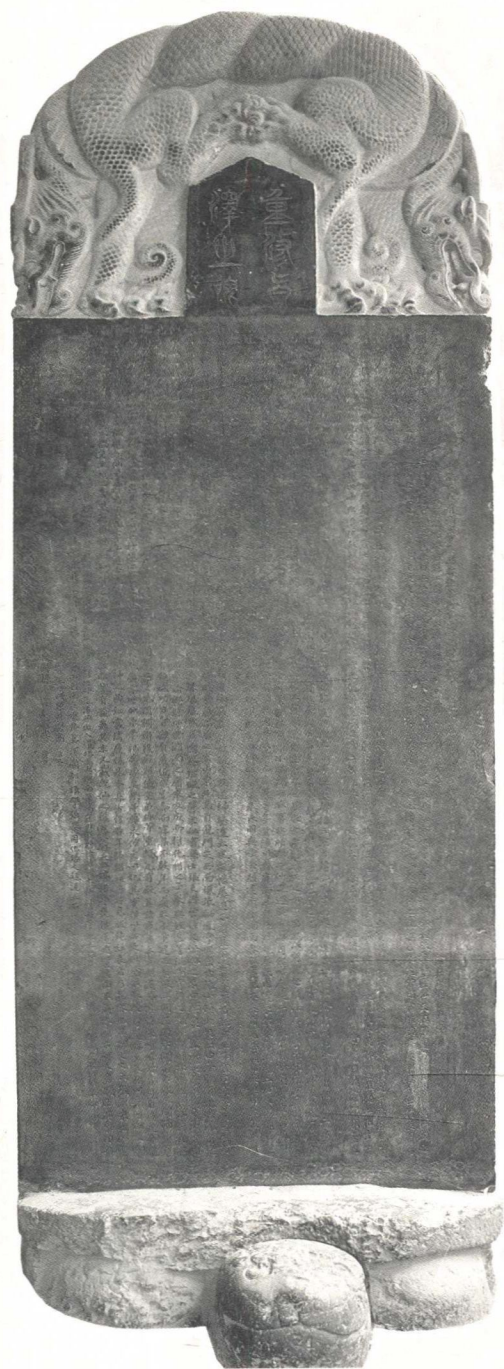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78-7-5457-0741-0



9 787545 707410 >

封扉题签：姚奠中



《三晋石刻大全》编纂委员会

顾 问：薛延忠 金道铭 申维辰 申联彬 李小鹏 高建民
胡苏平 张 平 李立功 胡富国 白清才 郭裕怀
杨安和 李学勤 姚奠中 张正明 令政策 李潭生
刘 江 张 颌

主 任：刘泽民

常务主任：李玉明

副 主 任：罗广德 李茂盛 刘在文 田中仁 雷忠勤 柴泽俊
刘纬毅 降大任 郭士星 赵望进 杨子荣 邢利斌
梁俊明 张玉洁 崔正森 贾玉瑞 翁小绵 陈 明
齐荣晋 于贵卿 宋新梅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敏政 石金鸣 史耀清 刘光彦 齐荣晋 张鸿仁
吴广隆 李 尧 李 非 李小强 刘合心 高 可
董占锁 董瑞山 潘孝忠 霍润德

总 主 编：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李玉明

副 主 编：罗广德 李茂盛 杨子荣 文 琴 张继红 落馥香

审 定：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编纂委员会

顾 问：张茂才 王清宪 康吉仁 任建宏 王克平

主 任：吴广隆

副 主 任：冯裕民 郭治琛 秦海轩 刘金锋 张广善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甫平 冯俊儒 杨秉聿 秦雪刚 商浩辉

办公室主任：杨秉聿

主 编：吴广隆 副 主 编：秦海轩 张广善

点 校：马甫平 编 辑：杨秉聿

摄 影：冯俊儒 资料整理：关 静 阎艳阳 秦江波 张旭平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陵川县卷》编委会

顾 问：石云峰

主 编：王立新

副 主 编：王发永 樊俊峰 郑林有 赵灵贵

编辑人员：赵灵贵 段明月 常红川 樊 幸 张韶波 郑 楷

校对人员：赵灵贵 段明月

摄 影：段明月 郑 楷

凡 例

一、以抢救和存史为收录原则。收录范围：以《三晋石刻总目》为基础，凡古代、近现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现存和佚失石刻全部全文收录（其中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社会文化价值的私人墓碑等除外）。收录上下限：上限从本地最早的石刻起，下限到定稿为止。

二、以县（市、区）分卷，原则上每县（市、区）一卷，另有山西省博物院卷、五台山卷、晋商会馆卷和总目卷。

三、“概述”为一个县（市、区）或石刻收藏单位总论性的文章，既有资料性，又有学术性，内容主要包括：石刻历史发展（收藏）演变情况、现在分布区域、类别、时代、数量和保存情况，重要石刻简述、主要特色和价值评估、保护和利用建议等。

四、石刻单位称谓：各类碑刻（包括造像碑）一律称“通”；石碣（或刻石），称“块”或“方”；经幢（包括石幢）称“尊”；墓志和墓志铭，有盖的称“盒”，无盖的称“方”；画像（图像）石、匾额、塔铭、法帖，称“方”或“块”；摩崖题记称“处”或“条”；石柱，称“根”；戒牒，刻在碑上的称“通”，刻在碣上的称“方”或“块”。石刻录文称谓：碑，称“碑文”；碣（刻石），称“碣文”或“刻文”（镌刻诗赋的，称“诗文”）；造像碑（含座），称“发愿文”；墓志铭和墓志，称“志文”；石匾，称“匾文”（镌刻帝王诏令的，称“敕文”）；摩崖题刻、画像石、石幢（内容非经文者）、石柱等，称“题记”或“题刻”；经幢，称“经文”；塔铭，称“铭文”；墓表，称“表文”；石对联，称“联文”；戒（度）牒，称“牒文”；法帖，称“帖文”。

五、不设篇、章、节，一件石刻独立成篇。全卷录文分两部分，即现存石刻、佚失石刻。以县（市、区）为纲，分别按时代顺序排列，不分类。

六、每件石刻编纂内容包括“名称”（全称）、“简介”、录文（全文）。另附照片或拓片。

七、凡属涉及人物的石刻，在“简介”中介绍人物的生卒年、籍贯、主要官职、生平事迹、著述等。凡涉及人物籍贯的，一律用原地名，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如郭泰，太原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市）人。

八、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不少石刻陆续由原址搬迁到异地，这部分石刻均以现收藏单位收录，地址一律按原址书写，然后注明搬迁时间和地点。

九、真假或断代暂无定论的石刻，可沿用旧说或存疑。有几种说法的，诸说并存。

十、纪年：1912年以前的石刻一律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唐贞观元年（627）。括号内公元年号前后不加“公元”和“年”字。1912年以后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中华民国16年（1927），也可写成“民国16年（1927）”。民国年号用阿拉伯数字，不用汉字。1949年10月1日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一、表示体积、面积等尺寸的，以“厘米”为单位。如长（或高）120、宽60、厚80厘米，长、宽均不加“厘米”二字，用顿号间隔。

十二、收录的石刻文字原为繁体字的，仍用繁体字；原为简化字的，仍用简化字。1957年汉字简化之后，有的碑繁简混用，录文尽量保持原貌，以保存史料的真实性。录文横排，原则上根据文意分段，不易分段的，可以连排。编者所加文字，用楷体字，并加圆括号，以与正文宋体字区别。如“（碑阳）”、“（碑阴）”等。

十三、收录的石刻文字，只作标点，不作校勘，原文中的错别字、异体字、通假字及不当之处等，保持原貌，不作甄别、注释和括注。

十四、石刻文字漫漶、剥泐不清的，用一字一“□”表示。漫漶、剥泐字数不清的，用“……”或“下阙”表示。

十五、索引按类编排，使本书既可按历史顺序阅读，又可按类检索，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总序

李玉明

石刻,指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石幢(内容非经文者)、摩崖题记、墓志铭、画像石等,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石刻,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专指“碑”;广义的理解,包括碑、墓志、造像等各类刻石。

所谓“碑”,汉以前就有了,但那时的碑不是为了刻字,而是立于宗庙、学校,用以观日影、记时刻、测方向的。古代礼仪规定,主人迎宾进宗庙之门要当碑而揖。祭祀时亦常常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牺牲先拴于碑上。碑在古代还有另一种用途,是立于墓前用于棺木下葬,称为“窆石”,下棺时用以固定轭轳。所以早期的墓碑中上部有穿,称之为“碑穿”,用以系绳下棺;在宗庙之碑则为系牺牲的牛羊所用。因此,最初碑的用途并非为了刻字,而是实用。

现代意义上的“碑”,兴起于西汉而盛于东汉。原来在西汉以前,即商周时期歌功颂德的文字铸刻在钟鼎彝器上,西汉开始以石代金,用碑记载功德和事件了。这即是金石铭文的由来。

从西汉“碑”开始镌刻文字以来,历朝历代的碑刻大体相似,均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但各类碑之间又呈现繁多的样式。碑头有圭首、圆首、平首、梯首、冠形首、螭首等。碑身以长方形为多,另有倒瓶形、六棱、八棱形、正方柱形、扁方形等。碑座有龟趺形,形状庄重,采用得最多。古人以龟为长寿,常常以龟(实际称鼋)背碑。碑的内容有功德碑,记载文臣武将的文治武功;庙碑,种类繁多,记述庙的修建历史;墓碑,记载死者籍贯、世系、事迹及卒葬时间等。还有记事碑、纪念碑、文告碑、诗文碑等。

从现代广义上讲,凡是镌刻有文字的石刻都可以称为碑刻,而在先秦时除“碑”以外,其他都不称碑,而称“刻石”。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刻石是商代的《小臣系毁》和一些石磬刻字。以后有秦石鼓文,秦始皇峰山、泰山、琅琊台刻石等。汉以后这些刻石逐渐统称碑石了。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道教兴起后,又出现了宗教刻石及造像。山西是我国中原地区宗教刻石最早产生和发展的省份之一,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以及现在散存在全省各地大量的经幢、石幢、造像碑等刻石,见证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另外,作为墓碑衍化物的墓志,起源于汉代,形制为长方形。而标准方形的墓志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唐,是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山西现存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志,封和宠、辛祥墓志;北齐裴良、庾狄回洛、姜叡墓志;东魏刘懿墓志等。

石刻最大的特点,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故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简称“石史”。它最大的功用,是可以证史、补史和纠正官修书面历史记载的舛误,在弘扬民族文化,借鉴历史经验,在为社会主义政治、物质、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来受到地方当局、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爱好者重视。例如,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殿堂式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1937年梁思成先生调查发现后,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殿前镌刻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经幢,解决了该殿学术上的两大问题。一是根据经幢的记载,该殿始建于唐德宗大中十一年(857),不仅使该殿是唐代建筑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而且使这座国宝级文物建筑有了准确的纪年,其学术价值大大被提升。二是从这幢经幢的记载中得知,佛光寺东大殿的施主(即捐资人)是长安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弟子“宁公遇”。由于施主的身份高,其建筑的级别也相应被提高。又例如,山西现存一万八千多处古建筑,其每处建筑的历史沿革,要么文献记载简单,多数只一句话;要么查不到任何记载。而这些建筑前前后后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主要靠现存碑刻的记载来解决,因而各座古建筑附属的碑刻就成了该古建筑历史沿革有力的证据。再例如,山西历史上的灾荒不断,元大德七年(1303)平阳、太原地区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清光绪三年(1877)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死亡百姓不计其数,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些灾荒,由于历史

的原因(如信息不畅),或是地方官员为保乌纱帽,有意隐瞒,因而文献记载零碎简单,甚至缺失无记载。而民间百姓在灾荒过后却镌刻了不少碑刻,使后人永志不忘。这些灾荒碑虽有不少毁于战火,或被人为破坏,但各地保存至今的仍有不少,已成为研究山西历史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宝贵资料。除灾荒碑外,存世的还有不少古代科技方面的碑石,是研究当地农林水利、医药等发展的重要实证。三晋石刻是我省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人文资源。因此,编辑出版《三晋石刻大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是功在千秋、荫及子孙的一件好事、善事。

自宋代兴起金石学以来,访求石刻是历代众多史学家、方志学家们的终生爱好和追求。山西自明成化十年(1474)创始《山西通志》时,就收录了“金石”资料,现在能够作为代表的是清光绪年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编的《山右石刻丛编》。这套《丛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共40卷,收录北魏至元代计14个王朝840余年的各类石刻720通(件)。还有在此之前于光绪十八年(1892)官修的《山西通志·金石记》(单行本称《山右金石记》),杨笃(秋湄)主编,收录汉以来碑刻1550余通。《山西通志·金石记》与《山右石刻丛编》比较,前者“有则录之,存亡不计”,后者“存者收录,亡者不述”。

山西历史上石刻最多时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文物部门的多次调查和普查,山西现存各类碑碣大约两万。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四属原都称州,大体上是现在的运城、临汾、晋城、长治四市,即山西南部地区。《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720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496通,占全省的68.9%;《山西通志·金石记》收录的1550余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993通,占全省的64%;现存的两万余通石刻中,上述四市占了全省的一半以上,叶氏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但除上述四州(四市)外,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碑刻存世,其中不乏精品,同样应予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和有关部门、团体,以及个人爱好者在石刻的调查、保护、拓印、研究、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比较零星分散,缺乏全面性、系统性;也没有一个专门访求石刻的机构,使这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其次,历史资料少而缺失,已出版问世的石刻著作,存量极少,不仅难求,而且收录不全。比如,《山右石刻丛编》和《山西通志·金石记》均只收录到元代,且遗漏不少,大量明清时期的碑刻未被采摭,造成历史的遗憾;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只收录山西唐以前碑石45通;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只收录山西元以前碑石近30通。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大量的拾遗补缺工作。第三,建国以来又新发现了大量的石刻,特别是新发现和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墓志铭、摩崖题记、造像碑等,大大丰富了山西石刻的研究资料。比如北朝至隋唐一批重要墓志的出土、黄河沿岸等处汉以来漕运摩崖题记和一批早期造像碑的发现,以及其他一大批新发现石刻的著录登记等,都是重要的石刻资料,这些都需要有人去进一步访求和研究。第四,石刻文物具有不能再生性的特点,毁一件即少一件。比如北周武帝二次灭佛,山西的汉碑及三国两晋碑除郭泰碑外,全部被毁。郭泰碑后来也流失不存,造成了“山右无汉碑”的历史遗憾。当前仍存在盗窃和建设工程中人为破坏石刻文物的严重现象,自然损毁也日益加剧,古老石刻随时都有流失和被毁的危险。因此,抢救保护石刻,将其全部著录在册,世代流传下去,是当务之急,是带有抢救和存史双重重要性质的宏大工程。

为了全面系统地开展三晋石刻的访求和研究工作,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即借鉴历史经验,适应形势的需要,挑起了保护研究石刻传统文化这个重任。从1990年开始,即着手分市编辑出版《三晋石刻总目》,到2006年底,已有9个市《总目》正式出版,共收录存碑11878通,佚碑4168通,合计16046通。

在基本完成《三晋石刻总目》编辑出版的基础上,从2007年正式开始编辑《三晋石刻大全》。《大全》以《总目》为基础,将新中国成立前后不论存佚,有文则存,全文抄录,并断句。同时,每篇加“简介”,附照片或拓片。基本上每县(市、区)1卷,山西博物院和五台山、晋商会馆各1卷,再加记事总目录1卷,全省预计125卷。

分步编辑出版的山西石刻研究成果,其资料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将远远超过以往出版的石刻著作,将成为山西有史以来的首创之作,流芳后世,意义深远!

是为序。

序 一

吴广隆

把人类社会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社会活动和理想信念记载下来,永久地留给后世,应该说伴生于人类系统思维的形成,很久以前就成为人类的一种追求,于是才有了岩画、刻画纹、陶器上的符号、原始的文字以及后来的金文、刻石等多种形式的历史记录,而石刻就是其中形式最为成熟,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

“托坚贞之石质,永垂昭于后世”,这是清末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对碑刻及其功能的形象描述。

碑刻记事的形式最初形成于西汉,之后便广为流传,一直为后人所应用,直至今日仍然发挥着证史、补记和纠正书面历史记载舛误的功能。

晋城位于太行山中,特殊的自然条件,成就了晋城碑刻的蔚为大观。千百年来,虽历经沧桑巨变,风雨侵蚀,人为破坏,碑刻在不断地产生与毁灭着,但晋城的碑刻,仍旧有许多被保存下来,且灵光不减。从晋城现存的碑刻来看,时间之早、数量之多、内容之繁杂,可以说是惊人的。所以清末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自己所著的《语石》一书中总结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这里的“泽”就是今天的晋城。从晋城编纂《三晋石刻大全》的工作实践来看,这个评价应该说是中肯的,是可信的,是言之有据的。

编纂《三晋石刻大全》是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所做的一件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大事、好事。根据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的意见,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对这项工作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最终形成了以市、县两级宣传部为领导,以各县文博工作者为骨干,由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为具体组织的工作体系。编纂工作从2007年4月开始到2010年初,历时两年多已圆满完成,全市四县、一市、一区共分为6卷。总计收入“三国曹魏”以来的石刻5137通,其中碑刻铭文4894通(条),隋唐以前的94通,中华民国时期的352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1044通。这些石刻碑记总体可分为记事、记人、记文三大类,其中以记事者为最多。记人者多为墓志、墓表,也有数量不多的事迹、遗迹记;记文者则多为诗词游记,也有一些经幢、牒文、飨令等。

在载入晋城《三晋石刻大全》的众多碑刻中,历史纪年最早的是一块三国曹魏时期的记事碑。这是一块名不见经传的早期石刻,发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泽州县山里泉水电站建设时期。石刻现存于水电站机房北面的石崖上,距河谷地面数十米。石刻摩崖而作,书刻面积高80、宽60厘米,文字隶体竖书,共9行95个字。内容为:“正始五年十月廿五日,督治道郎中上党司徒悌、监作吏司徒从掾位下曲阳吴放督将师匠兵徒千余人,通治步道作偏桥阁,凿开石门一所,高一丈八尺,广九尺,长二丈。都匠木工司马陈留成有、当部匠军司马河东魏通、开石门师河内司马羌。”经考证,这块镌刻于公元244年的石刻,记载的是一次政府组织的筑路行动。通过石刻内容,可以得知曹魏时期,政府对于山区的道路修筑是十分重视的,有专门的机构、专业的工匠和大规模的建造活动。同时还可以得知当年在太行与河内的崇山峻岭中还隐藏着另外一条以栈道为主的重要通道。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发现将成为太行山交通史改写的重要依据。这是历史典籍中所没有的重要资料。

在载入晋城《三晋石刻大全》的碑刻中,还有一些关于炎帝的碑刻。其中有通过遗址发掘发现的碑刻,也有来自墓志中的点滴记载。2003年在高平羊头山五谷畦发现的一块镌刻于北齐天保二年(551)的碑刻,在碑额上就镌刻有“羊头山”的字样。碑文中也有“神农”、“山号羊头”的记录。而另一块镌刻于唐天授二年(691)发现于高平清化寺遗址中的碑刻,其碑名即为《泽州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从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山炎帝之所居也”的记载。碑中还系统地记叙了关于炎帝的传说故事。另外,还收集到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几方墓志,尽管记载内容不同,镌刻时间不同,但墓志中都不约而同地记载了从唐天祐到五代晋天福,一直延续于宋元符时期,羊头山南麓的这片土地都被称作“神农乡”。凡此种种,都印证了一段历史或

传说,它们是记载高平羊头山炎帝文化的重要史料。

在这次编纂《三晋石刻大全》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批关于基层社会组织、管理、活动的重要碑刻。它们有的记载着家庭世系的关系与变迁,有的体现了家庭之间的管理理念,有的记录了不同区域的社会风俗与村规民约,还有的反映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村庄邻里间产生矛盾的过程,解决问题的办法,达成和解后的共识。这些碑刻记录无疑构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社会百科全书。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些与商业贸易有关的碑刻。如郭峪村在清顺治十三年(1656)所立的《阳城额设商税银碑》,碑中记载了当时全县商税银的总量和阳城四镇分摊的情况。碑文说:全县共缴商税银 230 两,其中润城缴 110 两、白巷缴 20 两、郭谷缴 40 两、县城缴 60 两。从碑刻中记载的商税银分摊情况,即可得知明清之际,阳城的商业贸易中心是集中在沁河流域的,润城、白巷、郭谷所摊银两占全县总额的 74%。这就告诉我们,当年这里的商业贸易起码占到了阳城全县商业贸易的 70% 以上。

石刻除了保存历史记录的文献功能,具有独到的史料价值外,还有其独特的传承雕刻、绘画、书法等美学价值的功能。

从这次收集整理石刻的情况来看,晋城市众多的石刻除大量以文字内容为主的碑碣、摩崖、墓志、题记等之外,石窟造像、造像碑、陵墓石雕、民居石刻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石刻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作为雕刻艺术,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高平羊头山石窟,它始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后历经北齐、隋唐,各代屡有建造,风格也依历史演进而不断嬗变,对研究古代雕塑艺术史的发展有很高的价值;又如高平《祁坟坟石雕碑柱》,精细华美,为清代艺术典型风格。

作为刻画艺术品,它再现了晋城地方艺术的成就,显示了工匠卓越的雕工技能。这些刻画艺术品,总体呈现雄浑朴实、稚拙灵活的艺术特点。如高平《北齐四面造像碑》融绘画与书法为一体,用浮雕、阴阳线刻等刀法展示了雕刻者高超的技艺。又如高平《西李门二仙庙金代伎乐线刻队戏图》不仅对研究古代戏剧有重要价值,仅其流畅的线条,传神的形象,就能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还有《苗匠神庙柱墩人物画像》、沁河沿岸民居古堡内的众多石刻装饰,多以神话、历史故事为题材,构图简洁,线条流畅,人物形神兼备,都充分体现了当时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人们生活及美好追求的深刻影响,皆为石刻珍品。

晋城石刻体现的书法艺术魅力,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帝王、将相题书的石碑。如清康熙帝为阳城县皇城村所题“午亭山村”及“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对联;王国光、张慎言、陈廷敬等留下的墨迹石刻,包括皇城相府诸碑、青莲寺诗抄碑、真泽二仙庙诗抄碑以及阳城博物馆馆藏碑等。这些碑刻大多以帝王之尊、庙堂之气、书风严谨为特点,以楷、行书体为主。

第二类,为文人雅士、书法名家题写的碑石。金代元好问诗书俱佳,其七言绝句诗碑现存陵川县西溪二仙庙,书法结体端庄,字字内敛,用笔劲挺利落,体势神采飞动,有晋人楷书之风范;乌政管神庙碑以集赵孟頫书体为能事,可见书风盛行,无处不在;书法名家董其昌、文徵明、王铎等文墨刻石流传泽州,为后人临摹学习提供范本,多以草书留世;阳城博物馆馆藏董其昌论诗碑,其书法清朗洒脱,秀逸空灵,富于天然之趣;沁水柳氏民居文徵明书家训四则碑,其书法劲健奔放,姿媚道劲,风骨烂漫;阳城博物馆馆藏王铎七言绝句诗碑,其书法力反传统之柔媚积习,标榜风力气骨,章法错综参差,纵横跌宕。

第三类,为地方达人书写的碑刻。晋城现存碑刻中以北朝、唐墓志最为精美。如高平《魏故襄威将军积射将军郭君志铭》属北朝刻石,文字讲究法度,体态多姿,方劲见诸圆厚,文气多于野趣。市博物馆现存唐初、中、晚期墓志铭数十块。因唐代国强民殷,疆域广大,文化气度恢弘,博大壮丽,又承接东晋书札、北魏墓志之风,楷法兴盛。如《唐故周居士墓志》、《唐故璩君墓志》、《唐故张府君墓志》、《唐故李君墓志》、《唐故居士张府君墓志》、《大唐故君夫人上官氏墓志》、《大唐故陪戎副尉张君墓志》等。其章法布局或松或紧,笔体或楷或草,笔法或方或圆,刀法纯熟,意味深长。金以后,特别是明清碑多以唐楷入帖,形成“馆阁体”,失去了书写的率真。随着时代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达,书法日益脱离其实用性,向纯艺术发展,成为少数人

津津乐道的雅事,碑刻实用价值受到影响。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晋城建市以后,虽也有不少文人墨客书刻于石,但多浮躁、无章法,好者寥寥。更有甚者,刻碑大多以工匠、电脑刻字作为书写文体,缺少了书法的艺术价值。

新编的《三晋石刻大全》,其最大的特点是在年代上占了优势,以定稿为下限,这就意味着我们收入的内容是非常全面的。不但涵盖了中华民国时期,还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年代。从我们所收录的碑刻,即可了解到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在这之前的一个世纪里,我们中华民族越过了重重的艰难险阻,推翻了帝制、驱逐了日本侵略者,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新中国。从县议员、小学校长到民国县长,从抗日民主政府到党支部、村委会、人民政府,立碑的主体在碑刻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样,碑刻的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修补寺庙到创建学校、兴建老年活动中心,从官宦私家的墓碑到闾村共建的抗日烈士纪念碑、革命烈士纪念碑,从修桥补路到“村村通”工程、创凿深井、新农村建设、开发营造绿色生态旅游区。这一时期的碑刻,如同一部近现代史诗,阅读碑文就如同徜徉于历史的时空隧道,自然会感慨万千。

在晋城,《三晋石刻大全》的编纂工作虽然已接近尾声,但是关于古代碑刻的研究,应该说才刚刚开了个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认识的发展,古代碑刻还会赋予我们更多新的、更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

历史会彰显出我们工作的意义。扶案回首,我们十分欣慰,因为我们对历史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心血。是为序。

序 二

中共陵川县委书记、县长 石云峰

陵川是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塔水河旧石器遗址的发掘,见证了早在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隋开皇十六年(596)陵川置县以来,勤劳聪颖的陵川人民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顽强拼搏,传承文明,创造并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宋金时期的“七状元”文化更是弥足珍贵,辉映千秋,光射华夏。目前,陵川境内有1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居全国第二,山西第一。这是陵川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陵川对外开放的一张特殊名片。

展示陵川各个时代的辉煌业绩不单表现在古代建筑形体上,也反映在遍布古陵大地的近千通古石刻上。石刻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长河中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最早用于表达思想意识和情感的实物媒介之一。它准确、翔实地记录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以及风土人情,是今人穿越古今时空、把握时代脉络,最原始、最宝贵的历史资料,也是我们鉴古知今的一面镜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大批反映社会主义新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陵川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成就的石刻应运而生。其中,礼赞“锡崖沟精神”,反映“村村通”工程,颂扬英烈人物等石刻是这一时期的主色调。陵川新时期的石刻大大丰富了陵川的石刻宝库,也充分展示了陵川跨入新时代以来的巨大变化。

陵川石刻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刻工精细,从一个侧面,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渊远流长、丰富灿烂的陵川文化,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作为陵川文化的一个支点,陵川石刻见证了历史,传承了文明,也闪现着陵川的灵魂。我们热切希望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珍爱石刻,呵护灵魂,全力保护好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陵川县卷》的出版就是保护和传承陵川历史文化的—个具体行动,对于繁荣陵川文化,弘扬陵川精神,推动陵川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为序。

概述

金石资料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较直观准确的原始载体,与当地的宗教、信仰、民族、民风、民俗密切相关,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文字、书法价值,是历史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

陵川地处太行屋脊,地属黄河流域,古为上党地区,历史悠久,文化遗存十分丰厚。辖区内,文物古迹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十四处,位居三晋之首。作为优秀文化载体的石刻遗存不仅数量多,而且价值高,具有重要的“存史、资治、教化”功能。

陵川现存年代最早的石刻题记是唐贞元年间的《崇安寺诗碑》,记载了东岗居士在崇安寺所题的一首诗。此外年代较早的是五代时期的石刻《乐氏二仙圣德之碑》,位于境内平城镇苏家湾村西北二仙庙废墟中,为五代后周显德年间镌刻。碑阳额题“乐氏二仙圣德之碑”,碑阴额题“大周皇帝千秋万岁记”,碑文记载了乐氏二仙的传说故事。此碑是陵川境内记载二仙传说故事最早的碑刻,同样是上党地区乃至全国最早的二仙传说故事碑,是研究二仙文化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宋代遗留下来的石刻主要有《北吉祥寺赐名碑》、《南吉祥院碑文并序》、《新修崇安寺三门碑》等。这几通石刻所在的北吉祥寺、南吉祥寺、崇安寺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这几通石刻是这几处国保历史沿革的重要佐证。《北吉祥寺赐名碑》勒石于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碑文记录了北吉祥寺原名“什柱院”,宋太平兴国三年中书门下赐额“北吉祥之院”。《新修崇安寺三门碑》勒石于宋庆历六年(1046),现存于崇安寺内,乡贡进士马骧撰并篆额,马世昌书。碑文记载了宋庆历年间新修崇安寺三门的情况。

金代是陵川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一个时期。目前保存下来的金代碑刻也比较多。其中有不少陵川历史上著名的七状元撰文的碑。著名的有赵安时撰的《重修真泽二仙庙碑》。赵安时,金贞元年间(1153-1155)状元,官至中顺大夫、南京路兵马都总管,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重修真泽二仙庙碑》勒石于金大定五年(1165),现存于西溪二仙庙。碑文记录了二仙的传说、二仙庙的由来及金大定年间的重修过程。

元代遗留的主要碑刻有《遗山先生元公留题》和《维大元晋宁路泽州陵川县云川乡平川里南吉祥禅院记》。《遗山先生元公留题》现存于西溪二仙庙中殿后墙,勒石于元延祐四年(1317),十分珍贵。碑文记录了元好问游西溪二仙庙时赞美西溪景色的一首诗:“期岁之间一再来,青山无恙画屏开。出门依旧黄尘道,啼杀金衣唤不回。”《维大元晋宁路泽州陵川县云川乡平川里南吉祥禅院记》勒石于元至治三年(1323),现存于南吉祥寺。碑文记录了元代重修南吉祥寺的情况。此外还有《重修真泽庙记》勒石于蒙古定宗二年,现存于西溪二仙庙。碑文记录了二仙的传说及元初重修真泽庙的情况。

明代保留下来的碑刻主要是创修、重修碑和诗碑。较具代表性的有现存崇福寺的《敕赐崇福寺碑记》、现存灵岩寺的《重修灵岩寺佛台记》、现存郊底白玉宫的《重修玉帝行宫碑》。明代碑刻中的诗碑较多,主要集中在西溪二仙庙和崇福寺。由此可知西溪二仙庙和崇福寺在明代香火旺盛,游客众多。明代诗碑之多,也可反映出当时陵川文化的繁荣。

清代遗存的碑刻数量最多,种类也十分丰富,有施政类、教育类、灾荒类、乡规民约类、诗咏类、义行类、记事类等等,从中可以汲取到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而且清代的碑刻大部分保存完好,书法、雕刻也十分精美,极具艺术观赏价值。

民国时期的碑刻以烈士纪念碑为主,也有部分施政类、教育类、乡规民约类、记事类碑刻。代表性碑刻有《石小平同志纪念碑》、《任区长义汉同志殉难纪念碑》、《蠲免号草木炭碑记》等。众多烈士纪念碑,反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无数革命先烈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其他类碑刻则反映了民国时期陵川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新农村建设时期,建桥修路,兴教修校,保护古迹等千秋功绩,也留下了大量的石刻碑记。尤具特色的是二十一世纪初礼赞锡崖沟开山筑路精神的碑刻共有近百通,都是全国各地名人题额。锡崖沟碑林,是推动陵川、山西乃至全国公路建设的动力源泉,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上述只是对陵川地区石刻资源的一个简要概述。由于我们在收集整理过程中遇到好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使得内容丰富、博大精彩的陵川石刻难以全部收录,缺憾显而易见。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收集整理,逐步加以完善,使陵川石刻的各种风采展示在世人面前,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陵川县卷》编委会

《三晋石刻大全》

荣列国家十二五规划、山西省十二五规划，并荣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2009 年度十大好书、优秀晋版图书一等奖、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

已(即)出书目(有★号者为已出)	定(估)价	已(即)出书目(有★号者为已出)	定(估)价
★《临汾市洪洞县卷》	600元	★《长治市沁源县卷》	350元
★《临汾市尧都区卷》	480元	《长治市平顺县卷》	400元
★《临汾市安泽县卷》	280元	★《长治市黎城县卷》	500元
★《临汾市侯马市卷》	260元	★《长治市长治县卷》	300元
★《临汾市曲沃县卷》	380元	★《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林卷》	400元
★《临汾市浮山县卷》	480元	★《长治市屯留县卷》	200元
★《临汾市古县卷》	380元	《长治市长子县卷》	240元
《临汾市隰县卷》	220元	《长治市武乡县卷》	280元
★《运城市盐湖区卷》	420元	★《太原市古交市卷》	200元
★《晋中市寿阳县卷》	580元	★《太原市杏花岭区卷》	400元
★《晋中市灵石县卷》	580元	★《太原市尖草坪区卷》	300元
★《晋中市左权县卷》	380元	★《吕梁市孝义市卷》	680元
★《晋中市榆次区卷》	410元	★《忻州市宁武县卷》	280元
★《晋中市和顺县卷》	300元	★《朔州市平鲁区卷》	280元
★《阳泉市盂县卷》	620元	★《大同市灵丘县卷》	200元
★《晋城市高平市卷》	680元	★《大同市灵丘县卷续编》	200元
★《晋城市沁水县卷》	500元	★《大同市左云县卷》	230元
★《晋城市阳城县卷》	660元	《大同市浑源县卷》	220元
★《晋城市陵川县卷》	480元	《大同市广灵县卷》	300元
★《晋城市城区卷》	480元		
★《晋城市泽州县卷》	690元		